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1.012

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列山新闻思想初探*

刘家林, 方 晨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冯列山是第一个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是新闻学研究德国的源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抗战时期他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颇多建树。不同于当时的留美新闻学者多关注于新闻实践应用领域的探讨,他对新闻学研究更注重对新闻学元问题的学理阐发。但这种德国式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模式,在抗战救亡的大环境下,并不能因应抗战对宣传人才的需求,因此没有形成影响力。

关键词:冯列山;新闻学博士;新闻思想;新闻学;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1-0074-05

学术界一般认为,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有两个重要源头。一是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的“美国式”实用新闻学流派,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其代表人物是沃尔特·威廉博士(Walter Williams);一是以德国莱比锡大学新闻研究所、慕尼黑大学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德国式”理论新闻学流派,将“新闻”和“新闻学”作为研究对象,重视新闻学“本质”的学理阐释,其代表人物是莱比锡大学第一任新闻学教授卡尔·毕希纳教授^①。前者比较专注于技术性、功利性的实务研究,后者则以理性的思维见长。长期以来,

研究者说到民国时期中国新闻教育史和新闻学源流,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以“密苏里模式”为代表的美国模式。这是因为“密苏里模式”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思路,不但暗合了中国知识界急于“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而且为中国新闻教育提供了一套成功的例证可供参考模仿,并能解决实际问题。^[1]这使得美国模式无往而不利,迅速为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等学校所照搬和模仿。

* [收稿日期]2013-10-27

[基金项目] 环球时报奖学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践教学创新基金)研究生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刘家林(1953—),男,湖北武昌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外广告史、教会报刊史等研究。

方晨(1988—),男,安徽黄山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华侨报刊史等研究。

^① 卡尔·毕希纳(karl bücher)也译作卡尔·毕歇尔、卡尔·表西亚、卡尔·别赫、卡尔·布赫尔,关于其生平可参考刘兰珍《卡尔·毕歇尔与德国新闻学的兴起》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日本新闻学鼻祖小野秀雄,即是他的学生,学成归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建立了新闻学研究所,开启了日本新闻学研究重视学理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重视学理探讨的传统。

我们不禁要问,代表了新闻学另一个源头的“德国模式”在中国有无播下种子?如果答案是,何以没有开花结果?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开始了调查和研究工作。事实证明,德国新闻学教育为我们培养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列山。

一、冯列山其人

冯列山,1907年出生,福建福安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2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2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在慕尼黑大学获新闻学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①。留欧五年期间,曾任上海《申报》驻欧记者,写了大量的通讯。这期间戈公振先生曾数次去信鼓励他多写些新闻学的文章。他接连写了《德国新闻纸的研究》《美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法国新闻事业的现状》《英国报纸的概观》等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向国内读者介绍欧美先进国家的报业情形,受到戈公振先生的称赞。1937年抗战爆发经伦敦回国,在上海《申报》任职,经常撰写社论。上海被日军侵占后随《申报》迁往香港并任主笔。1938年8月任胡文虎星系报业的《星岛日报》主笔。1939年星系报业收购新加坡《总汇新报》,他主持该报改革,使之很快有较大改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取道滇缅公路回到重庆,应陈望道之邀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1943年迁居成都,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兼在四川大学讲授新闻学。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在上海真如复校,1946年成立新闻系,冯氏应聘主持该校新闻系两年,为该校第一任新闻系主任。1947年冯列山赴新加坡,进入《南洋商报》,初在出版印刷部任职,不久调任商报主笔。在新加坡期间,他仍热心华侨新闻教育事业,1949年曾依托新加坡华人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为期3个月的新

闻学研究班。1963年至1964年,他又在《南洋商报》内主办新闻工作者训练班,并兼任授课讲师。1971年5月起,他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直至1972年5月1日退休。1998年8月12日,冯列山在新加坡逝世,享年91岁。

二、对新闻学“元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德国是现代印刷术的故乡,也是现代报纸的直接诞生地。目前来看,也是新闻学研究的发源地。1609年,德国出版了《艾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1615年创刊的《法兰克福新闻》视为第一张“真正的”报纸,因为该报有固定名称、每周定期出版一次、每张纸上印有数条而不是单条新闻。1650年,出版商里兹赫在莱比锡创办《新到新闻》,这是德国乃至世界上第一家日报。40年后的1690年3月5日,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莱比锡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托俾厄斯·波伊瑟(Tobias Peucer),完成了名为《关于新闻报道》(De Relationibus Novellis)的论文^②。这是世界上第一篇以新闻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由此开启了把新闻当做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尝试。1916年莱比锡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后又成立了新闻研究所,这比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迟了8年。此后明斯特大学、科隆大学、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新闻研究机构,“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学校得到了承认。不过德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教授的课程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新闻教育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以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为目的,教授的课程也以如何撰写新闻稿件、如何采访、如何为稿件加标题等为主。而德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则因袭了欧洲大学一向藐视实用职业领域的传统,也

① 1934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学位。冯列山在慕尼黑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距此不过1年时间,从时间上说,冯列山也是世界上最早获得新闻学博士的人之一。据笔者目前统计,1949年前中国人中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有3人。另两人分别是栗恩堤和袁昶超。栗恩堤系194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曾任冯玉祥秘书。1949年自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因政治上不认同新中国,直接由美国赴菲律宾参加《民族日报》编辑工作。袁昶超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斯坦福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抗战胜利后寓居香港,著有《中国报业小史》。

② 陈力丹:《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1690年托俾厄斯·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见《现代传播》2012年第10期。

带有德国人擅长的哲学思辨色彩,更注重新闻的“本质”(德语 *wesen*)等元问题的研究和思考。纵观冯列山的新闻学研究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学术思想明显受到德国新闻学研究的影响,非常注重新闻学“元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新闻”的性质

在冯列山看来,对“新闻”下定义只能反映新闻的一面,因此他主张从新闻的生产过程来讨论新闻的性质。他将新闻的生产分为四个阶段:

- 1.必须是社会上最新发生的事件。
- 2.经过第三者——新闻记者的报道。
- 3.应用最迅速的交通工具传达。
- 4.经过编辑程序,然后公开发表。

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他分析认为新闻具有社会性(公共性)、时新性(变动性)、客观性、问题性等基本特征。首先他认为,新闻记载的是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自然界接触发生的事实,而凡是新闻,“总直接或间接与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有密切的利害关系”^[2]。他分析了新闻采写过程中记者受到了价值观、立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出“新闻是应该正确的,但绝对的正确报道,事实上却不可能。”最后,非常有趣的是,他指出新闻的性质还包括“问题性”。事实上,他提到的“问题性”即我们现在理解的非事件性新闻。他指出这一类新闻即“新闻记者凭其锐利的眼光,从社会现象中提出的一个公众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3],访问记、特写都属于这一类。他举上海报纸关于推出女性新式服装辩论的报道,指出这一类新闻对于媒体吸引受众的重要价值。

(二)关于新闻业商业属性与社会属性的问题

在冯氏看来,“德国新闻学者眼中的新闻学与英美新闻学教授的主张,几如二物,有无从贯通之感。”^[4]他指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报纸最重要的使命乃反映舆论,宣扬文化,非在经营商业,所以新闻学所应注重亦首为舆论与文化因素,不宜专谈商业的有关技术问题。所以美国新闻学教授所提倡的新闻学,一向即因此受人指摘。”^[5]但对于美国新闻的商业化以及报业托拉斯的形成,冯列山并不排斥。甚至在教学中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例如,老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邵嘉陵就指出,冯列山讲授的“德国二元论报纸

的文化意义和商业性并重”。^[6]

但对于过度的商业化倾向,冯列山曾多次表达深切的忧虑。比如他指出,“现在报纸出版人的心目中,报纸……与汽车工厂、钢铁工厂等相同。目的在于牟利。……现代报纸是在这种畸形之下发展的。”^[7]“报纸业至此便成为了广告的附庸,变为完全商业性质的一种企业。”^[8]“……一部分报纸变本加厉,流于低级趣味,遂被称为黄色报纸(*yellow paper*),新闻到了黄色报纸中手,也毋须乎在讨论什么原理与定义了!”^[9]

(三)关于“报学”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范畴的认识

冯氏认为,报学是新闻学的渊源,新闻学不等于报学。新闻学(*Journalism*)一词,含有“报纸杂志事业”与“新闻记者职业”二义,在德文中对应词为 *Zeitungswissenschaft*,含义就是“报学”。因此,当初命名的“新闻学”,主要就是指“报学”。他举出了当时学者对报纸出现的三种假设:源于口头报纸;源于“新闻书信”(news letter);源于印刷报纸。他认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到1930年代,“报纸杂志绝不能再包括新闻学的全体”^[10],遂提出“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应包括三类:

1.属于纯理论性者,例如研究新闻学的任务及范围;新闻事业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新闻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舆论的性质及发展史;宣传问题;报纸、杂志、电影、无线电广播的历史,以及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等项。

2.为新闻事业的技术原理。即采访、写作、编辑等问题;商业部门内的广告——电影与无线电广播的技术部门亦应列入。

3.如实用问题。即与实践相结合。^[11]

在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新闻学》中,他将这种划分做了进一步细化,认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涵盖:

1.理论新闻学,包括新闻哲学,新闻伦理,比较新闻学,新闻法,舆论研究,言论原理,新闻原理,报业史,杂质史,广播史,电影史,宣传学,新闻政策,出版业史,时事分析。

2.实用新闻学,包括采访,新闻写作,编辑,社论,报业管理,广告,印刷,电讯、杂志业、电影业、广播业。^[12]

他之后解释道:“理论新闻学的使命,在使我

们理解新闻事业与性能及新闻记者职业的任务;实用新闻学的作用——使我们明白技术原理与应用方法,作为就业以前的准备。新闻学能否成为名实相符的科学,这两点是个先决的前提。”^[13]

很显然,从冯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时作为新闻学者的冯列山已经有一种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希望建立像哲学、物理学、化学等其他学科一样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而冯氏关于理论新闻学与实用新闻学的划分,已经与我们当前对新闻学范畴的划分十分相似。只是有趣的是,冯氏两次论述中都将“电影”划入新闻学体系,并一再强调“宣传学”在新闻学体系中的地位。

冯氏将“电影”划入新闻学体系,与卡尔·毕希纳教授的新闻思想基本一致,体现出他新闻思想中浓厚的德国“因子”,而强调宣传学的作用与效果,应当与冯氏在留德期间目睹戈培尔的宣传策略有关。

(四)关于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

以冯列山为代表的新闻学者迫切希望建立完整的新闻学学科体系,与当时就已经出现的“新闻无学”的论调也有密切的关系。冯列山认为,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奋斗,无显著的成绩,时常受人指责,这是事实。但是以学校教育培养不出出色的记者而否定新闻学的作用却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当时新闻教育缺乏的是实践教学,应大力推动新闻实践。他用医学院培养医生的例子指出,成为优秀的医生,必须也要经过无数的临床实践,而要成为优秀的记者,道理是相同的。如果认为新闻学院培养不出优秀的记者来,那么医学院的大可不必招生了。显然,冯氏还是十分看重学院的新闻教育的。

事实上,如前所述,冯氏看重新闻学院的技能教育的同时,更加看重新闻学院对于学生新闻道德素养的教育。在前述的学科划分中,他将“新闻伦理”放在靠前的位置。他认为新闻业是拥有“社会性”的,新闻业的影响遍及全社会。因此,新闻的“职业责任任远较其他自由职业者繁重”,所以“新闻记者一旦不能称职,便足以妨害及社会与国家。”^[14]所以,他强调新闻记者的理想教育,任何合格的新闻记者要“不负社会付托的使命”,“对于新闻事业的神圣任务,有深刻的认识”,“有生命可以牺牲,信念绝对不可动摇的决

心。”^[15]

(五)关于政治新闻中的宣传

在西方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旧有的新闻学被认为缺乏受众观念。事实上,冯列山却较早就意识到受众与媒体关系。在《新闻讲话》中,他单独列出《新闻读法》一章进行阐述。而他单独讨论受众对于媒介内容的理解,也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在冯列山看来,新闻的理想境界是自由的传播。但是亲身目睹了纳粹的新闻宣传统制和政治新闻的纷繁复杂之后,冯列山认为,对于政治新闻特别是宣传意味的政治新闻一定要学会“新闻读法”,才能透过表面事实了解事情的真相。他将“新闻读法”定义为站在读者立场的一种有计划的读报,任务就在于“让剔除这类表面烟幕——使事实重归于事实,让所有的宣传部分自行暴露目标”。

因此,他提出了“新闻读法”的四个方面:

1.易处入手:选择感兴趣的一方面新闻加以仔细阅读,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

2.提纲挈领:设法找出新闻报道的主干事实,剔除新闻背景(冯氏称为“穿插”)、次要事实等细枝末节。还可以阅读不同报纸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做到心中有数;

3.小处留心:仔细推敲政治新闻的消息来源、新闻人物,与平时了解的政治常识相比照,就能辨别出什么是宣传;

4.旁敲侧击:从新闻报道中揣测反面的意义,或者搜集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对照当时的政治新闻报道,他例举了可以揣测反面意义的例子:比如出洋考察,表面是奉命派遣,多半是官场失意。又比如“在友好的商谈中,彼此的意见已完全一致,这至少说明,会议过程中,彼此的观点恰恰相反,甚至曾经发生剧烈的争执与摩擦”^[16],等等。

三、德国模式何以输给美国模式

今天,以后来者的眼光来审视冯列山对新闻学许多问题的探讨,我们会发现,他所关注的问题,仍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理论研究仍需要回答的问题。不过因为以下两个主要原因,冯列山所代表的德国式新闻学研究,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

第一,德国的新闻学研究重视学理的阐释,但

是对急于想培养大批的记者、宣传员,从事抗日宣传的国民政府和新闻界来说,德国的新闻教育模式过于“形而上”,满足不了这一紧迫需求。而美国的新闻教育模式,则以训练学生的实操能力见长,正是救国图存的现实所需要的。因此,美国式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模式,特别是密苏里模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第二,具有欧陆教育背景的新闻学者,特别是德国新闻学背景的人数甚少(除冯列山外,笔者所能缕述的在欧洲学习过新闻学的,仅有毕业于伦敦大学新闻系的曹亨闻和留学法国学习新闻学的中国青年党秘书长胡国伟)。而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闻学者则俨然行成了一个“密苏里帮”,并占据了国内主要新闻学系的重要教务职位和重要报刊的编采职位。因此,就影响力而言,美国新闻教育模式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1947年冯列山赴新加坡办报,此后再未回国。1949年以后,随着政权的更迭,新闻的生产范式和教育模式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故鼎新,欧美的新闻学观点和教育方式被彻底全盘否定。原先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德国新闻学源流,在中国大陆从此就彻底失去了根脉。冯列山曾经计划写作《新闻学通论》《世界报业概观》《新闻伦理》《新闻哲学》等一系列著作,“对于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职业二者之间,建立一种纯学理的根据”,并在任教的五六年间,陆续写了六七十万字,但是因连经变乱,最终都没能出版。这也使我们失去了系统、全面了解其新闻学术思想的机会。1951年他将在燕京大学时期对新闻系学生的演讲稿,进行修订整理,结集为《新闻讲话》出版,全

书约15万字,成为他唯一的一本新闻学著作。他死后,家人将其大部分藏书和生前手稿、书信捐赠给马来西亚新山市顺利花园的报馆街陶德书香楼,2005年8月又辗转移交给当地民办的南方学院(现升格为“南方大学学院”)。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冯列山在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史中的地位和贡献应该被我们记取。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目光转向这位被历史遗忘的学人。

[参考文献]

- [1] 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A].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 陈力丹.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1690年托俾厄斯·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J].现代传播,2012(10).
- [3] [4] [10] 冯列山.新闻的意义[J].民主论坛,1947,1(2、3合期).
- [5] [6] [11] [12] 冯列山.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J].时代生活,1943(创刊号).
- [7] 邵嘉陵.我所了解的陈望道及其电视片[EB/OL].<http://news.fudan.edu.cn/2005/0331/6591.html>. 2005-3-31.
- [8] 冯列山.英国报业的概况[J].东方杂志,1935,32(8).
- [9] 冯列山.美国新闻事业的研究[J].东方杂志,1935,32(11).
- [13] [14] [15] [16] 冯列山.什么是新闻学[J].报学杂志,1948,1(5).

(责任编辑:朱德东)

Initial Exploration on Journalism Thoughts of Feng Lieshan, the First Journalism PhD of China

LIU Jia-lin, FANG Ch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Feng Lieshan was the first Chinese who got a journalism PhD and was a representative who used journalism to study that the source of Germany was in China. In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h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journalism research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field.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 elaboration on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journalism bu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ournalis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however, this kind of Germany-style journal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 model could not meet the demand of Anti-Japanese War propaganda talents under the big background of Anti-Japanese and rescuing China, thus, this model had no impact.

Key words: Feng Lieshan; journalism PhD; journalism thoughts; jour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